



天圆地方时空观及其“取象”逻辑

李 川

摘 要:立象为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要词语之一。“象”是天人相参、王道政治的核心观念,六经皆可包括于象之中。不惟如此,我国战国时期的文学深于比兴,盖因其深于取象之故。由此说来,取象观实乃华夏文化的根本思维方式。“天圆地方”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宇宙观之一,是我国古代关于天地形状的一种认识,是中国古人宇宙论的基本观念。天圆地方观念以及其附属的四象二十八宿、分野观等乃是其取象观选择的必然结果。基于取象观发展出来的,是华夏先民独特的时空观,这套时空观又影响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看待万物的眼光与现代科学时空观有所不同。

关键词:天圆地方;取象;时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5-0072-07

一、“取象”观略说

“立象”(或曰“取象”)是中国古代典籍的核心词语之一。《尚书·益稷》曰:“观古人之象。”^{[1]297}《周易·系辞上》曰:“立象以尽意。”^{[2]171}《诗经》之“六义”赋比兴皆以取象为教化之途径。孔子修《春秋》,垂法万事,绝笔于获麟,麟与“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之龟以及“凤鸟不至”之凤,皆为教化之“象”。关于此,章学诚言之甚晰:“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3]2}“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3]18}章学诚之论,可谓先获我心。“悬象设教”为古人教化之本,这是由古人的宇宙论和人

生观所决定的,三代以降的思想,皆以人为上天所生,所谓“天生烝民”^[4]“天生民”^[5]乃先秦伦理思想的基础,因此有“天胤”^{[1]374}“天民”^[6]等称谓,这种说法类似于埃及人之“太阳族”,反映了人类存在的神圣状态。人之存在是世俗和神圣的两重存在,“惟人万物之灵”^{[1]382},人之灵明被视为源自天、源自神明。

正是由于人类的神圣性,故在对于人类的认识和教化方面,乃有所谓“神道设教”^{[2]73}之论。神道设教的思想又基于两个基本划分,第一是天道与人道之分,第二是君子与小人之分。天道与人道之分显而易见,君子与小人之分是古典社会、前启蒙时代的普遍共识,荀子说:“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7]古埃及《普塔霍特普教谕》也宣称神明禁止让民众参与决策,诸如此类的教诲在世界各大古老文明中比比皆是,兹不赘述。基于这两重划分,古典政教因此显示出“天工,人其代之”^{[1]292}的本天治民思想。民既然有君子与小人的差别,而天道又非

收稿日期:2023-11-07

作者简介:李川,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主要从事神话学、比较文学研究。

人人所能知晓,故需要教化,此即古代经典产生的逻辑前提。职是之故,在古典文教传统中,教化为最基本的文献样式。书教、诗教、易教等提法,今人虽不尽能详但必然耳熟。教化之本正是“天与人参”,是“王者治世之大权”。但天并不能言,既然人类的教化本诸天道,如何体察不言之天的意图呢?“悬象”便是天道和天道相互沟通的基本手段,象首先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这些现象通过古典思想家赋义,将其视为体现天道的手段。天道因其以显象的方式传达,古人谓之“天显”^{[1]434};天道因其阴阳不测,古人谓之“神道”^{[2]73}。要而言之,“象”是天人相参的第一中介。由日月之运行、季节之推移、天地之变化,“象”的含义遂逐渐扩展到王道政治的诸多领域,龙凤、麒麟、赤乌、白鱼,推而至于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皆被赋予“象”的功能。“象”因此成为古人理解人类自身、理解整个宇宙的锁钥,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钤键。“六艺莫不兼之”^{[3]18},六经皆可包括于象之中。从天道的角度说,象惟恍惟惚,“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皆为象;从人道的角度说,可因象而悟道,“求道而恍若有见”。这就是“悬象设教”的内涵,也是“神道设教”“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之价值意义所在。此义东周以前的思想家知之甚深,“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3]19}。随着西方现代文明逐渐占据世界主流,中华古典文明受到冲击,古人天人相参的宇宙论、世界观被漠视、歪曲甚或“打倒”,现代人以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取代了古典思维方式,天道不再与人道相关,更不再是教化的起点和根基,而只是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天道被客观对象化之后,人作为神圣存在这一层次的意义也就相对泯灭,“究天人之际”的命题因此转化为人类如何解释自然、征服自然的主题。取象观即便再被提及,也绝不会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它只是学术研究的知识和对象,不再为伦常提供价值和意义。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取象观实乃华夏文化的根本思维方式^①。此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甚巨,其中就包括长期支配中国古典文化的天圆地方观。

“天圆地方”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宇宙

观之一,是我国古代关于天地形状的一种认识,是我国古代宇宙论的基本观念。这种时空观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古典政教制度传统下,历代帝王无不遵循一种既定的祭祀范式,就是在都城南北两侧分设天、地两坛,以分别祭祀苍天和大地。天坛建成圆形,谓之“圜丘”(或“圆丘”);地坛建成方形,谓之“方丘”(或“方泽”)。这种苍天和大地祭坛形制的来源,乃是基于古典取象观推本而来,这种天地观就是“天圆地方”,是华夏先民之于苍天和大地思想投射。“天圆地方”说由来已久,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形成背景如何?下文尝试论述之。

二、“天圆地方”说之来源

“天圆地方”说乃我国最古老的宇宙观。其来源有两说。一说出自盖天说。古宇宙论有盖天、浑天、宣夜三说^②,“天圆地方”出自盖天说。古代之所谓天,实际兼包天地。故“宣夜”言天者之外,另两说皆笼括天地而言之。盖天说分两个支派:一支派“盖天之说”主张“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另一支派主张“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前者认为,“天”必须是“盖”子,不可以转到地下去;天地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既不相交接,也不互相包容。后者则认为天地乃是拱形的。因此有“第一次盖天说”与“第二次盖天说”之别^③。“天圆地方”是所有盖天说的共同特征。

另一说认为黄帝创立“盖天说”^④。这种说法的根据可能在先秦典籍之中。《黄帝内经·灵枢·邪客篇》《吕氏春秋·序意》皆有相关提示。《序意》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是法天地”^{[8]274}等语。所谓“大圜”,正是古人对苍天的称呼;而所谓“大矩”,乃以称地。由此看来,将“天圆地方”追溯到黄帝也有其文献学依据,说明天圆地方观念由来之久。

上述各家之说,宣夜说、浑天说、盖天说,以及关于“盖天说”起源于黄帝的传说,乃是古老相传的观念,难以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加以科学证明,而只能从思想史的角度予以阐释。实际上,这正是古典取象观支撑下的重要内容,反

映出华夏先民对天地体认的悠远传统。天圆地方的观念最晚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以及辽宁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这方面的考古学、图像学证据不少,可参考刘敦愿、冯时的相关研究^⑤。文献证据也不绝于书,“周人志之”的说法确实有迹可循,典籍明确记载了“天圆地方”为诸物所“取象”的情形。《周礼·考工记》有“軫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9]。《庄子·说剑》“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10]。《楚辞·天问》“圜则九重……地方九则”^[11]。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舆,圆天为盖”^[12]。《鹖冠子·泰录》“无规圆者,天之文也;无矩方者,地之理也”^{[13]248}及“法天居地,去方错圆”^{[13]246}。《吕氏春秋·序意》“大圜在上,大矩在下……上揆之天,下验之地”^{[8]274}。上述皆为先秦典籍之明证。汉代《淮南子》之《天文》《原道》《览冥》《本经》诸篇、贾谊《新书·容经》、班固《白虎通·文质》以及唐宋史志、类书乃至说部文献对此记载也绵延不绝,体现出源远流长的深厚传统。

然上文天圆、天圜杂出,是否一意呢?许慎《说文解字·口部》云:“圜,天体也。”段玉裁注曰:“圜,环也。《吕氏春秋》曰: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按,天体不浑圜如丸。故《大戴礼》云: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卢云:道曰方圆耳,非形也。《淮南子》曰,天之圆不中规,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镇也,其道曰圆。地,谛也,其道曰方。许言天体,亦谓其体一气循环,无终无始,非谓其形浑圜也。下文云:圆、圜全也。斯为浑圜。”又于“圆”字下曰:“圜者天体。天屈西北而不全,圜而全,则上下四旁如一,是为浑圜之物。《商颂》‘幅陨既长’。毛曰‘陨、均也’。按《玄鸟》传亦曰:‘员、均也。’是则毛谓员陨皆圆之假借字。浑圜则无不均之处也。《笺》申之曰:陨当作圆,圆谓周也。此申毛非易毛。”^{[14]277}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只是平圆和浑圆之别,然看段注的意思,天之圜或圆,指的是其“道”的大化流行无始无终,而非其具体的形状如何。然古人也将天体之圜理解为“浑圆”,这是否与

其说矛盾呢?实则道之始卒若环,表天象的“圜”,二者本质气息相同,并无什么矛盾之处。只是必须理解,天之圜或圆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其形,而必须由形推象,因象见意。若从科学意义上理解第二次盖天说,则以天盖为拱圆形,从而与浑天说的“浑圆”相似而有合流的趋势。从上文所引可知,古代汉语语用中,“圜”和“圆”两字本就相通^⑥,这对“天圆地方”宇宙观与“浑天说”彼此融而合一起了助推的作用。汉武帝造《太初历》请浑天家落下闳参与其事,“浑天说”因而大行于世。如此一来,太初改历本是“浑天说”较“盖天说”更足取信,可实际上非但没有对盖天说构成冲击,反而借助“浑天说”的传播,使“天圆地方”观更加普及,深入其时广大的普通民众之中。由此反观《周髀算经》的记载,早在西周初年商高与周公的对话中,就有“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15]之语。这充分说明周初天圆地方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从而为周朝的礼乐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所谓“圆璧祭天,黄琮礼地”的说法就是天圆地方观念在制度上的反映。

通过以上的史料学证据,不难看出,“天圆地方”乃是系统化、影响深远的宇宙观(或曰时空观),这套宇宙观形成伊始,就与阴阳五行学说紧密结合起来,并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建筑设计、墓葬制度、货币形制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天圆地方”观的阐释

从“天圆地方”观产生的根由层面,笔者认为其不可仅仅归因于直观感觉,而是源自先民的取象意识。有学者认为“天圆地方”时空观产生自人们的直观感觉。这种观点的意思是,天圆地方观乃是古人对天地形状的直观感觉,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的朴素宇宙观,从而也就缺乏理性基础。这种观点为不少学者所认可,比如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史家郑文光和陈久金等。郑文光说天圆地方观是“一切原始民族当中”最早出现,同时也是“朴素的、直观的宇宙图式”;陈久金则认为天圆地方观念乃是“很早”而又“朴素”的对于天地的观念;还有学者认为,

“天圆地方”基于人类对于天地的“直觉印象”，从而也就只能是一种“感性认识”^⑦；等等。对此，笔者简单归纳之，这是一种对天圆地方观的直观起源说，或者说朴素认识论，就是认为“天圆地方”观缘起于人们的直观感觉。对“天圆地方”观产生的根由问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其理解路径，从这个角度讲，主要可归结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路径，乃是纯粹物理意义上的，即将“方圆”看作古人对天地的实际形象感觉。显然，这套理论的难点，不在于解释“天圆”（圆天为盖的印象本是极易获得的），而在于如何解释“地方”，因为实际上站在野外四望，所获得的地平线的感觉并不是方的，而是圆的，古人对此应当和现代人的意识无别。因此那种将“地方”理论归结为古人地方观念源于对地平线的认知的讨论，是颇值得商榷的。另有论者提出自己的解释，认为“地方”乃是一种直观感觉下的认知模式，因为居住在平原地方的人根据田地、领土之方形，进而会类推到大地也是方形^⑧。这种理解有其合理性，然而也略显牵强，因为自然形态下的大地不是方形的，在人为规划下田园、领地等才会被划分为方形。田园之方、领地之方倒很可能是天圆地方观念的具体应用，而不太可能是其产生前提。因为，田地、领地是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是根据考古资料来看，“天圆地方”观的产生年代要远远早于田地、领地的产生时间。这个问题在前文有所交代，“天圆地方”观的产生时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彼时乃是一个所谓神民杂糅的灵巫世界。因此，将天圆地方视为根据对田地的直观感觉而来显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倒置。有学者指出，古人是借助方、圆图式来表达天地观念的，这套观念又衍生出两种造物形式。一种形式是“外方内圆”，另一种形式是“外圆内方”。代表外方内圆的对象是玉琮，而代表外圆内方的则是汉代的规矩铜镜。这也意味着，“天圆地方”观是中国造物领域的一种原型参照物。或者说，一方面它代表了对事物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也是对价值模式的体察^⑨。这位研究者从造物形态的角度讨论“天圆地方”观，并且利用了大量考古资料，其说有一定参考价值。该说将

“天圆地方”观与考古器物联系起来，已经进入史前礼仪制度的层面，较之于从地平线或田地等角度推论，更有说服力。然而，该说仍然停留于“天圆地方”观念之“用”的层面，并未真正解释清楚何以“地方”的问题。

第二种路径，是从艺术考古角度出发的理论思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该论者认为良渚文化中玉璧与玉琮配套使用，二者之间通过一条管道沟通，蕴含着沟通神民、协和上下的宗教观念^⑩。这种设想是有道理的，它深入华夏文化的精神精髓，玉璧、玉琮正是华夏先民“象天法地”的礼器，“天圆地方”正是华夏先民思维方式的折射。这种观念与实际的天地形状并无本质关联，而是在巫觋传统下，先民对天地自由心象的一种创造性表达。玉璧和玉琮都只是先民取象的产物，这种制度代代沿袭，成为先民生活共同体的精神财富，也成为其共同的文化认同符号，先民不需要对天地进行实际的测量，而只需要自由地认定天地就是如此，强调的是主体的主观感知，先民的价值与意义世界也便由此而生。因此，何以“地方”的问题就根本上不成为问题。

上述两种阐释路径不尽如人意。我们在前文指出取象观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的支配意义，“天圆地方”能否从这一立场予以观察？立象以尽意，所以“类万物之情”，“天圆地方”并不仅仅关乎“形”，而重在其涵存有“曷”或曰“道”。然历时既久，人们对此“道”的本来意义已然淡忘，以科学眼光考察其来源无异于南辕北辙。唯其如此，要理解天圆地方观在古典传统中的价值意义，理解天圆地方观对于古典传统中“道”“曷”的承载，就有必要引入古典取象观思维方式。或许从这一角度，天圆地方观之“立象以尽意”或“载道”的面相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四、从“取象”角度看“天圆地方”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

曾子曰：“离！而闻之云乎？”

单居离曰：“弟子不察，此以敢问也。”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谓之圆，下首谓之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且来，吾语汝。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兴作也。”^[16]

当曾参弟子单居离请教什么是“天圆地方”时，曾子以天地所生上首、下首为区别，来解释方圆二语，这个理解角度和弟子显然不同。弟子问，如果天圆地方的话，那么大地的四角如何与圆天相合？曾子弟子所问的乃是一个自然哲学的问题，而曾子所回答的，却是一个伦理哲学范围内的问题。这反映出天圆地方观念在春秋时期因精神革命而引发的不同思想取径。返回头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这段对话，就可以看出曾子是通过揭示天圆地方说的内在矛盾，从而顺理成章地将其从自然科学范畴引流到伦理哲学范畴。在自然哲学范畴内，蕴含着两种认识论的可能：其一，否定天圆说，而主张天方说，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方形的天能和方形的地正好合拍。其二，否定地方说，而坚持地圆说。这两种倾向，前一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夏思维里根本没有天方的传统，但是地圆的痕迹却并不少见。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惠施的“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⑩。庞朴认为，惠施可能有主张地圆说的意思^⑪。但是，黄克剑主张，这实际上是一种宇宙无限论，即“无边无际的天所覆盖的无边无际的大地”^[17]。无论哪种看法，这都是对“天圆地方”观的一种全新阐释和赋义。实际上，曾子也好，惠施也罢，尽管或许“弱于德而强于物”^[18]，但他们都不是自然哲学家，而是华夏传统所培育出的先贤，其对“道”的阐释虽然未必完全吻合本源意义上的“天圆地方”之取义，却完全符合立象以尽意的古典阐释路径。

由是言之，华夏先哲不赞成仅仅从“形”来论天圆地方的问题，而指出应从“道”的角度加以理解。正因为强调道，便从“阴阳为礼乐仁义

之祖”引出了华夏居天之中央的观念。中华文明有文字可考者始于夏。夏者，《说文解字》释为“中国之人也”。段玉裁注：“引申之义为大也。”^[14]²³³所谓中国人，乃“居住在天之中央的人”。金文夏字由大头、大白、大手、大足之形构成，可见古人视“夏”为神圣。《尔雅·释诂》释为“大”，《方言》卷一亦释曰：“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19]因而，华夏中心论就是天圆地方观的必然产物。这种华夏中心的意识，尤其突出地体现于二十四史的史传叙事传统之中，二十四史传统乃是一个以中华为中心，四方为蛮夷之邦的叙述架构，这种架构是古典天下观对世界秩序的一种设想。由此就逐步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为华夏叙事的基本范式。

从“天圆地方”观的天道观层面，其背后所寄寓的人文政治观念亦由取象观推衍而来。在《周易》《周髀算经》《吕氏春秋》等先秦两汉文献中，“天圆地方”说与其说是一种基于自然哲学的数理模型^⑫，毋宁说这是从自然哲学之数理模型出发，经长久发酵而形成的一种哲学隐喻，这个隐喻的内在哲学根基就是“天动地静”^⑬。经过曾子、惠子等对天圆地方之自然哲学的质疑和重释之后，它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施用领地，成为中国伦理观的主要支柱，并深刻影响到中国人的精神境界。由此再重温《吕氏春秋》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就能领会到其扑面而来的人文气息。例如：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颡项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8]⁷⁰³

这段话中所谓的“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指天地而言，因此说这是“天圆地方”观念的产物，当然天圆地方观念的产生要远远早于《吕氏春秋》等书的记载。所谓的“天圆地方”并不是对苍天和大地物理属性的描述，而是着眼于人文精神维度的阐释。《吕氏春秋》之所以名为《春秋》，正是承续六经的思想脉络，中国古典传统

并没有西方的“末日论”时间观,而是一种基于四季观察建立起来的循环时间,这个循环时间制约了历史表达方式。《吕氏春秋》就运思而言,乃是一部“图王”之作,以天、地、人三才为大框架,在三才框架下展开其治国理念的论争,由“法天地”而下降于“审之人”。所谓“法天地”乃是古典取象思想的运用,意味着对阴阳四时之变的顺应。古典政教传统中有“月令”一类著述,比如《大戴礼记·夏小正》等,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律令施行“四时教令”,这种以自然规律为施政依据的做法,正是构成《吕氏春秋》一书的大纲大本。从取象观的角度立论而观,天圆地方观念与《吕氏春秋》的主旨互相表里照应。有学者指出,《吕氏春秋》从自然推人事,由自然之客观必然性论述社会秩序,并由此引入天命问题,指出天命是客观力量对人事现象的约束^⑤。这种看法笔者并不赞同,吕不韦不是自然科学家,或者说当时人根本就没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对自然之“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我们难以找到诸如决定论或目的论一类的观念,主宰此书的乃是“大化流行”的天道观。就此而言,“天圆地方”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文政治观,强烈的人文色彩正是华夏古典时空观的根本特色。这种时空观虽然明确地记载于上述几部典籍,但是其真正的奠基作品却是六经中的《尚书》,比如: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1]251}

这是中国时空观的奠基之作,该文中包含有天圆地方理论实践。所谓“天圆”,就是羲和测量上天,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确定历法,而所

得的历法为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合乎整个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数。随后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确定四方的秩序,阐扬尧的教化。此处的四方又逐渐由地而天,形成四象观念和分野学说。四象是作为宇宙形态的思维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嬗变,最终确定为由五种动物组成的四组灵物,并逐渐形成四象二十八宿的古典天文学体系。二十八宿的形成时间,根据现代科学推算,在公元前5670年左右^⑥,这就说明,此体系渊源甚为古远。四象包括东宫青(或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或朱鸟)、北宫玄武(为龟蛇合体之象),其形成应当更早,因为其体系更为简约、直观。四象二十八宿因其明显的象征特征,被有些研究者视为基于“相似律”之上的巫术观念^⑦。笔者认为以诸如西方的“原始思维”说为理论基础,用巫术观念来评鹭四象的思维模式,可能值得作进一步研讨。究其原因,那就是中国实际上是通过取象观完成其精神革命的,天圆地方观念以及其附属的四象二十八宿、分野观等乃是其取象观选择的必然结果。

总之,中国古典时空观乃由取象的思维方式来。基于取象观发展出来的是华夏先民独特的时空观,这套时空观又影响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看待万物的眼光与现代科学时空观有所不同。

注释

- ①李川:《侨易释“象”——现代性反思与华夏源始逻辑刍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②按:此三说出自《晋书·天文志》,参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8页。③钱宝琮:《盖天说源流考》,载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65页。④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20页。⑤如刘敦愿:《天圆地方思想的起源及其艺术表现形式》,载《刘敦愿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7页;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⑥比如:屈原《天问》载“圜则九重”,洪兴祖《楚辞补注》云“圜与圆同”,朱熹《楚辞集注》亦言“圜谓天形之圆也”。直接证据则是《韵会》:“圜,法钱也,或作圆。今方圆皆作此圆字。”参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页;朱熹:《楚辞集注》,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1页;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4页。⑦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陈久金:《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载《科技史文集》第1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59页;金祖孟:《中国古宇宙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⑧刘沛林:《天圆地方说考辨》,《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⑨许边疆:《“天圆地方”观与传统造物设计》,《肇庆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⑩邓淑苹:《由“绝地天通”到“沟通天地”》,《故宫文物月刊》(台湾)1988年第67期。⑪按:这是惠施“历物十意”之一,载于《庄子》一书。关于其分析,参见黄克剑:《名家琦辞疏解——惠施公孙龙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4页。⑫庞朴:《中国的名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⑬武家璧、武旸:《中国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及其数学模型》,《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2期。⑭王胜利:《“天圆地方”观探源》,《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⑮李家骧:《〈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和天命论》,《台州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⑯赵永恒、李勇:《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⑰程万里:《传统文化中的四象观念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
 [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1224.
 [5]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4250.
 [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2915.
 [7]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316.
 [8]吕不韦.吕氏春秋集释[M].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1977.
 [10]王夫之.庄子解[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339.
 [11]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86-90.
 [12]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89.
 [13]黄怀信.鹖冠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周髀算经[M].钱宝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1:22.
 [16]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8:587.
 [17]公孙龙子:外三种[M].黄克剑,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14.
 [18]吕惠卿.庄子义集校[M].汤君,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605.
 [19]尔雅[M].管锡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4.

The Space-Time Concept of the Round Heaven and Square Earth and “Image Taking”

Li Chuan

Abstract: “Li Xiang” (image creation) is one of the key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he concept of “Xiang” (image) is the core concept of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benevolent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Six classic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concept of “Xiang”. Literature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adept at using analogy and association, probably for it is skilled at “taking images”.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image taking”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thinking in Chinese culture. The round heaven and square earth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osmological concepts in human history. It is also a fundamental concept of Chinese cosmology. This concept, along with four images, twenty-eight constellat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outlook are emerged from the thinking method of image tak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a unique Chinese view of time and space has been developed, which in turn shapes Chinese way of life, and offers an alternate perspective compared to the modern scientific views of time and space.

Key words: round heaven and square earth; image taking; time and space

[责任编辑/闰 闰]